

# 意識形態與大眾媒介：

## 關於決定論的問題\*

馮建三 譯\*\*

### 《本文節要》

本文主旨在探討經濟組織與大眾媒介之互動關係，如何決定了媒介內容。作者並不認為經濟力量是左右文化產物（如媒介內容）的唯一因素，或最重要的條件。相對的，他認為國家或其它政治因素，優勢文化，及媒介從業人員的「自主性」等都會影響媒介內容的產出。

不過，作者強調，要分析大眾傳播之變動現象，應以經濟結構之分析為起點，這是過去一般學者所忽略的研究途徑。

結論中作者認為，過去研究大眾媒介對社會的作用，一方面太過重視媒介與國家的關係，忽略了經濟因素（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傳播工具的控制；另一方面，則太過強調內容分析的結果，因為這些符號上、文意上的分析並非很可靠的「證據」。

這篇論文的中心題旨是，有志研究當代大眾傳播現象的社會學家應該嚴謹而詳細的考察，經濟組織與大眾媒介運轉的變動過程以那些方式，決定了大眾媒介所能提供的訊息種類。這個題旨並不等於說，經濟力量是左右文化產品的唯一因素，也不是說經濟力量在任何時空之下都最為重要。此外，我們並沒有如一般評論者所說，「在市場營利的

---

\* 本文原名“Ideology & The Mass Media: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由Peter Golding及Graham Murdock合著。

\*\* 本文譯者馮建三為英國李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博士班研究生。

壓力，以及媒介訊息的意識形態成份之間，劃上了牢固不可分的等號」（Connell, 1978:71）。我們無意否認國家與其他政治領域的因素，對於媒體運作也有相當重要的約束與控制。我們也認識到優勢文化對媒體產生了明顯的約制。再者，從業人員所能擁有的「相對自主性」，他們因職業關係而產生的意識形態所帶給媒介成品的影響，都是我們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就「相對自主性」一詞來說，我們以為重要的是「相對」。是以，對於霍爾（Hall, 1978:239）主張，「就完整的分析而言，探討經濟決定性的程度，是必須而非充分條件」，我們深表同意，但我們要強調的是「必須」。聲稱以社會學眼光分析大眾媒介所產生的意識形態作用，卻沒有著力於解析經濟過程，只能算是局部的研究。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儘管英國學界研究大眾媒介的作品大幅增加，所缺者，卻正就是就此「必須」所做的分析。將這個缺失，放在近二十年的英國社會演進狀況中，更是讓人覺得難以理解。

晚近，英國的大眾傳播事業急劇膨脹，其中絕大部分是私人產業的擴充。首先是經由新視聽產品的進入市場（如唱片），次則跨國經營的方式先行打進傳統的出版界，繼之則滲透到原本完全是公共領域的廣播部門（1954年出現商業電視在先，1972年的無線電台在後）。相形之下，公共傳播部門的擴充遠遠落後，只有BBC電視台第二頻道與地方無線台的相繼開放。尤有進者，私營傳播活動經營，幾無例外，多是由寡頭獨斷的少數企業集團在推動，以全球作為其謀求利潤的舞台。因此，幾家傳播公司主宰文化生產事業的能耐，近年來是只增不減。BBC在一片走「私」的浪潮中，是僅存的例外。並且，BBC的經營，在很多重要項目中，愈來愈向資本主義的求利原則靠攏〔註1〕。

面臨這種情勢，我們更覺得必須再次聲明：分析大眾傳播現象要以正視此一變動的經濟結構作為起點。然而怪異的是，就在跨國企業集團爪牙四伸，加速延伸其支配力量之際，絕大多數討論媒體的學術著作，卻將關於經濟決定論的種種問題排除在分析焦點之外。認為英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喜歡強調新聞從業人員的相對自主性，從而認定媒介所陳現的訊息，並沒有定於一尊，是自由派學者一貫的論調；他們以為國家（state）是主宰媒介自主性的最主要壓力；他們在探討關於大眾媒介的政治或文化角色時，似乎以為不去檢視其經濟結構的動態，同樣可以很充分的處理這些問題。事實上，對保守或多元論者而言，輕視經濟的分析，原本不足為奇。奇怪的卻是馬克思社會學對於文化問題的論證，竟然也出現相似的現象。

霍爾（Stuart Hall）指出，堅持經濟決定論的重要性實在是馬克思主義的首要原則。「捨此，則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社會學在理論上無所區分」，他說，「離開了關於決定論的問題，我們等於割斷了整個馬克思式的論證」。可是，英國社會學界以馬克思主

義者自居的主流派，霍爾在內，關於決定論的問題，迄今尚未見到稱得上完整的分析。造成這種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對於經濟化約論的反動，極力要避免將大眾媒介視為工具，只在赤裸裸的反映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利益與意識形態，並進而阻礙了勞工階級意識的形成。我們同樣反對如此決然的立場，但卻又同時注意到，在捨棄命定論的同時，主流派也忽視或力有未逮而未從事具體的經濟分析。因此他們等於以另一種方式，嚴重地斷傷了馬克思主義論證的力量與獨特性。以下，我們將舉多年來在傳播研究領域相當重要，而且影響力深遠的霍爾與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著作，以說明這種情況〔註2〕。

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的人共同指出，該中心的目標在於「從寬廣的馬克思主義架構中，提煉出有關文化與意識形態形成過程的理論，既不偏頗經濟論也不單表觀念論。」如此的聲明不僅貼切的傳達了他們的特徵，同時也概括了英國馬克思文化研究的要旨。這種對抗經濟化約論的馬克思研究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比如，湯普生（E. P. Thompson）〔註3〕因此而斷然捨棄上層與下層結構這兩個概念作為分析類目，他寧願鑄新詞，以經濟與文化為相鄰的領域，彼此以辨證的關係相互影響。湯氏說：「特定的價值體系與特定的生產模式須臾不可分離；特定的生產模式而沒有相應的價值體系，令人難以想像。實際的情況並不是誰依靠誰的問題……二者應實為一體之兩面。」

在英國的傳播研究中，具有雋永地位而影響長遠的書，「革命之道長且遠」（The Long Revolution, 1965），威廉斯表達了近似的立場。他揭示道，與經濟上的工業革命，政治上的民主革命舉頭並進；文化上，在教育與傳播體系深入普及民間的過程中，也展開了長遠的革命。他認為這三種過程界定了當代生活的百般經驗；三者持續不斷的互動，說不上誰是領頭前進的力量。在這樣的認定下，他以為，必須研究文化、經濟與政治的繁複互動過程，「而不可以優先分析任何一個領域」。理論上雖然這麼說，但稍後在具體解析英國的當代大眾傳播現象時，威廉斯（Communications, 1968）不時的體認到經濟結構的關鍵地位，也對經濟過程對於文化生產的決定性影響表示同感。他承認，巨靈般的傳播公司控制愈來愈多的媒介，確實是目前最為急切需要解決的一種課題；是以他說，「資本主義的商業經營與態度」，其滲透日漸深遠，「逼近了傳播領域的核心」。面對這些事實，他提出，更多的公共所有權，是改變現狀最重要而且是唯一的途徑。

在理論取向與具體分析之間，威廉斯顯然無法統一立場。一方面他說，「以經濟決定論觀照文化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的獨到貢獻……」，但在其他場合中他又堅稱在文化生

產過程與經濟動態之間，「無法找出依賴的關係」。可是，回到具體分析時，他還是清楚地指出，私人企業的膨脹波及當代大眾媒介的結果，已經大幅威脅到傳播體系所能傳達的訊息種類與內涵。在「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1974:151）一書，他鏗鏘有力的論道，各種處理訊息的電子科技、錄影帶、衛星傳播與有線電視：

可以被用來影響、改變，甚至有時候可以控制我們的整個社會運作……它們是深遠之文化革命的現代工具，足以用來教育民眾參與民主的過程……然而，它們也可以在跨國企業集團的操縱下，淪為反動的工具，在營利的判準之下，使得人無老幼之分，羣體無大小之別，從新聞到戲劇，在在侷限了他們所能體驗之生活經驗的範圍，以及他們對於問題的回應方式。

在最後這麼個節骨眼，雖然是繞了一圈，決定論的問題終究要求取得應有的地位。只可惜，在理論上，威廉斯從來沒有就此做一系統性的探討。

霍爾的情形，如我們前面提及，也認定了經濟決定論的問題實是馬克思社會學討論文化的重心。但他不及威廉斯之處在於，這樣的體認絲毫沒有出現在他對當前大眾媒介的分析；經濟論的問題僅只是在宣告之後就被束諸高閣，供奉一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關心的焦點別有懷抱，源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與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他認為此二人「是繼馬克思、恩格思與列寧之後，對於建立馬克思上層結構理論與上層／下層關係，最有建樹的人」。葛蘭西與阿圖塞共通之處是，他們以為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對於維持資本體系生產關係的運轉，重要性與日俱增。兩人苦心孤詣，強調意識形態具有相對自主性，有其特殊的生存之道並能產生獨特的效能。既然如此，那麼，意識形態的分析不僅只是可以自成一格，而且其內在動力可以免脫外圍的經濟環境，單獨運作。霍爾最近在一篇文章極力主張，現代大眾媒介的成長「與壟斷資本主義同時出現」，但是「歷史上這些媒介所成長擴張的經濟面向必須先存而不論；全盤的精力應該集中在分析媒介充作意識形態工具這個事實」。我們的主張恰好反道而行：欲求充份解釋大眾媒介成為「意識形態工具」的緣由，必須先將媒介定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商業文明之一環，才有可能得到答案。霍爾界定問題的方式，註定只能偏頗而抱殘守缺的解釋意識形態產生的過程。

阿圖塞的影響從「意識形態工具」（Ideological Apparatus）一詞的使用，可見一斑。阿氏所謂的意識形態，「不僅只是一種相對定形的信仰系統；更是一連串的行爲、羣己關係與社會制度的總合」。是以，「研究特定社會的意識形態，並不是要分析它們是由那些觀念、思想或表達形式組合而成，而是要探討意識形態工具，是在那些特殊事

項 (specific practices) 身上表現出來，是根據那些物質運動規律而運作。」如果他們真的遵循此一方向進行分析，倒也大有可為，但睽諸事實，大多數屬於這個派別的媒介研究，並沒有真正的這麼做。這些研究大多是迂迴而閃爍其詞，好像單單是從某些媒介的訊息裡，就可以瞧出意識形態所賴以表現的特殊事項與其賴以運作的物質規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研究受到種種符號學分析 (semiological analysis) 的重大影響。以阿圖塞的術語來說，符號學一直像是「稚犬」(pup) 一般，在當代馬克思意識形態分析的「四足之間」(between the legs)，不停游走。

符號學的基本假設是，「在一定意義下，每篇文章 (text) 都是其社會生產關係的綜合表現。」這無疑是相當合情合理的說法。並且，符號學分析認為，經由閱讀這些文章，可以將這些生產關係和盤托出。媒介成品原料 (如五花八門的事件，層層相因的社會關係，與時下流行的種種意識形態)，必須先行轉變為不同的文化形式 (如連續劇、新聞節目、檔案記錄片等等)，才能被一般人閱讀、聆聽或觀賞；而不同的文化形式，也分別有其特殊的表意過程，運用不同的符號系統 (a range of codes and subcodes)，傳達它們的訊息。因此，在他們看來，媒介成品就是符號化的訊息，就是關於社會本質的訊息，就是關於媒介組織之間生產關係的本質，就是媒介本身與其他組織以及社會過程之關係的本質 (Hall, 1973, 1975)。因此，關於大眾媒介的分析工作，主要便在於解碼 (decoding)；目的是從不同的文化形式，找出蘊藏其內的各種社會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以符號學手法解析媒介的訊息，乃變成了一種社會知識的考古活動。運用這樣的方法所做的研究，最佳的例子，莫過於霍爾對於1974年英國普選前夕，PANARAMA這個時事評論節目所做的剖析。

威廉斯曾說：「電視的時事評論不但攸關政治，它也同時是一種文化形式的表現，從中我們可以得知種種外顯或內涵的社會關係」。霍爾引申其意，他揭示了電視時事評論節目，以什麼方式，透過那些形態，在重現以國會為軸的政治結構時，一併賦予了當前政治秩序合法的地位；他又分析，經由那些角度，我們可以從這些節目看出當前的廣播組織與國家及政治的結構關係 (Hall et al., 1976; Hall, 1976)。

儘管這些分析豐富了我們的知識，但總的來說，它們仍然無法令人滿意。其一，在二個重要層面上，PANARAMA與一般典型的節目，相去甚遠。例如PANARAMA的「現場」節目，其生產關係即時攤開在眾人眼前無所遁形；但是影片、連續劇與其他先行製作再行播放的非現場節目則大不相同。由於播送以前即已完成製作程序，因此它們的根本生產關係無法從節目的形式判定。再者，廣播從業人員與政治和國家制度的關係，在PANARAMA這樣的節目中，原本極為公開而且正式，要從中找出這些關係相對

的就容易的多；在更多的節目中，情況卻大相逕庭，製作人員所承受的其他具有決定性的壓力（尤其是經濟方面），很難以解碼的方式呈現出來，因為這些壓力運作的方式更為隱而不顯。是以，問題並不只是在於設計更多的解碼模式，以求納入更多不同類型的節目。其二，除了前舉有關節目典型的問題以外，更根本的還在於方法論。以符號分析找出社會與結構的關係，有其根本上的困難。做得再怎麼好，符號分析充其量只是內容分析的變形，因此也就無法免於因推論而衍生的難題。主張所有文化的表現形式，都包涵了生產與結構關係是一回事；主張經由符號的分析就可以了解這些關係在文化節目的生產過程所起的作用，又是另一回事。而符號分析不能達成這樣的目標。我們認為，在過度強調符號作為分析對象的情況下，文化與傳播社會學已受到嚴重損害。符號分析自有其重要性而且仍屬必須，但它不能取代以社會學角度從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著手，分析文化生產過程的地位。

從霍爾等人對於PANARAMA的分析，不但看出了方法論上的問題，也同時映照出當前英國這方面研究的焦點所在：專注於媒介與國家之關係的分析。於此，葛蘭西與阿圖塞再次有其深遠的影響。霍爾等人尾隨葛蘭西，說道：「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過程裡，代表資方利益的某些黨派，發揮了主導力量，他們在建構國家（state）之時，也同時創造了有利於他們的意識形態，從而就在國家這個領域取得了『文化霸權』」。他們的這些論調，以為國家在組織與維持社會現狀之合理化的過程中，扮演著樞紐角色，在阿圖塞甚有影響力的概念「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之下，更形強化。

由於對國家分析情有獨鍾，他們全神貫注在媒介體系裡，最與政治領域密切產生關連的一種媒介——廣播。除了也分析報紙中關於新聞的報導之外，他們完全忽視了其它徹頭徹尾是商營的媒介部門。第二，他們挑選的分析素材，又全是與政治體系或國家機構有關的題材（比如：議會政治、法律與司法體系的新聞，或國家在勞資爭議中的角色的新聞等等）。其三，在分析的素材裡，又完全以實際上發生的事件作為對象（比如：新聞、時事評論、社論，與記錄片等等）；電視中的其它類型的節目，為數更多，卻全給忽視了。就如稍前指出的，這些偏差再次的引出了關於推論與概括的重要問題。

將經濟的動態關係排除在分析核心之外，代之以分析媒介與國家的關係，必然是只能局部解釋當前的情境。它無法分析不同媒介部門之間，日益增長的經濟關係；從而它也就無法分析在這種情形下，控制結構的變遷與文化產品在種類與形式上的差異。同樣的，它忽略了英國大眾媒介日益國際化的現象〔註4〕，從而無能透視在理論上，應該如何調整英國媒介在全球傳播經濟體系上的位置。儘管在理論的樹立對歐陸有所取法，在

具體的分析層面，英國的馬克思文化社會學實在算是相當偏狹。雖然，單從解析媒介與國家的關係，而不及於跨國資本主義與媒介的牽連，就必定會出現這種偏狹的分析結果，但這仍然是讓人扼腕的事。我們稍後將在討論新聞的編採等生產過程時指出，這麼做的結果，將是一種闡割式的詮釋。這並不是說，國家不是一個重要的分析面向。如我們後文探究文化帝國主義時要指出的，國家是重要，但將它放在一國與跨國的經濟結構之內，才能充份的掌握住國家的重要性與角色。

儘管威廉斯與霍爾的分析存在著前述問題。但在強調文化生產過程的特殊性格（亦即若干程度的相對自主性）之時，他們至少堅持地認定，經濟上的生產關係在最後關頭（in the last instance）仍然產生了決定性作用。近來，他們這樣的思維方式，卻遭到兩種立場截然不同的人之責難，分別由因第（Barry Hindess）及其同僚，以及史麥塞（Dallas Smythe）作為代表。

根據因第的說法，試圖堅持經濟力量在最後關卡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又賦予文化領域以相對自主性，實在是徹頭徹尾、從根錯到底。他們認為只能有黑白兩種選擇：要就是採取決定論的立場而歸諸於某種化約主義，要不就是採取相對自主性的立場而歸諸於將文化領域的活動視為完全的自主。他（們）認為，有關生產關係與文化及意識形態表現形式的關聯，有必要另以不同的概念加以界定。亦即，與其拿決定性或最後關卡這些字眼來討論，不如代之以「存在的條件」（conditions of existence）。在他（們）眼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雖然有賴於某些文化與意識形態所提供的「存在條件」，但這絕對不是說，經濟生產模式決定了文化的表現形式。是以，他們的立場與湯普生極其相近，全然拒斥了經濟力量的決定性作用。

站在另一極端批評霍爾與威廉斯的人，以史麥塞最具代表性。在他眼中，他們的問題不是沒有守住經濟決定論，而是沒有貫徹始終，沒有以實例加以分析。他說，「從歷史物質論的角度研究大眾傳播體系，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它們替資方所執行的經濟功能是什麼」。他的答案則是，媒介「吸引」住數目相當的閱聽人，將他們賣給了廣告商，以刺激他們的潛在消費行為。史氏認為，媒介所能產生的意識形態上的功能，倒還在其次。雖然我們贊成史麥塞的呼籲，認為分析大眾傳播現象必須以經濟因素作為核心，但卻不能同意他的若干論點。第一，他的分析完全以美國的報紙與商營電視作為對象，難免流於以偏概全。其次，並不是所有大眾傳媒介都倚賴廣告而生存（出版業、電影、流行音樂、公營廣播電台等，幾乎不必有廣告而可以暢銷）；在沒有廣告的情況下，媒介體系仍然會不時的複製意識形態。史麥塞完全忽視了此一事實，因此也就無法更精緻的討論，在經濟力量對媒介體系施加壓力的動態過程中，我們所接觸到的訊息是怎麼形

成的。

對於這樣各走極端的立場，我們深不以為然，我們希望兩極之間可以另闢蹊徑。在強調文化生產事業所必然具有的相對自主性的同時，擊舉關於經濟決定論的大旗，做為我們從事分析的焦點。

毫無疑問，大眾媒介是傳達意識形態的工具。但前述以威廉斯與霍爾等人為首的馬克思文化理論主流派者認為，媒介「最主要是（first and foremost）屬於意識形態研究的範疇」，則是我們無法苟同的地方。透過它們對於當代社會生活的描繪，資本主義在英國發展所造成的結果，如權力與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給呈現出一付合理的樣子，當然是大眾媒介很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效果。但我們所不能同意的是「最主要」這個詞。對於我們來說，大眾媒介「最主要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下，生產與分配商品的工商業組織」（Murdock & Golding, 1974:205-6）。因此我們認為，如果不去掌握媒介生產訊息的經濟動態過程，以及這些經濟因素所產生的不同性質的決定性作用，是不可能充份理解意識形態的生產過程的。

這些經濟因素產生影響的大小與層次，隨著媒介的不同與媒介內部分工的差異，互有出入。最粗淺的一層，經濟資源的分配，先天上判定了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是那些媒介。比如在英國，激進（radical）的報紙無法大量流通，主要原因在於進入報業市場的成本太高，以及廣告收入的分配過份失調。經濟律令也約制市面上媒介的形式。比如，很多開發中國家的電視，以播放室內為場景製作的節目為主，實在不符合他們以戶外為主的羣體文化；電視之所以與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社會需要背離，卻又被使用做為一種重要的媒介，主要原因還是長期以來，跨國公司對於它們的經濟支配。同樣的，在這些國度，主要以都市新聞為準的報紙，也談不上能夠服務廣大的鄉村人口。就同一個媒介單位而言，經濟律令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從社教節目到樣式不一的娛樂節目（如連續劇、歌唱、綜藝節目等等），從國際新聞與〔社會〕犯罪及色情新聞的採訪，各應該分配到多少製作經費，那一樣不是根據節目吸引閱聽人〔進而廣告主〕的能耐而決定？

當然了，不論經濟力是單獨或與其他情況結合，而使得媒介訊息的生產過程有所侷限，必須以個別例子為依歸而有賴於實證研究予以支持或否定。這也正是我們的主張：未來關於媒介的研究，應該以這樣子的實證研究做為起點。為了要突顯我們自己的觀點，以示有別於前面那些人的分析，我們將簡短以二個研究領域為例，進一步申論於後。第一是有關（尤其是廣播）新聞（news）的研究；第二是有關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的研究。前者已有相當多的文獻足資參考；相形之下，後者則為文化與傳播社會學家所忽視。我們覺得這樣的忽視，也正就說明了以文化研究為取向探討大眾

傳播現象時的侷限性，就此而言，它與政治經濟取向分析的分野已經立可判見。

新聞由對於外界的詮釋而產生，消費者衆，因此關心媒介之意識形態作用的人，對它情有所鍾而多加分析，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論是那一種媒介，以局部的視野報導事件，是件毫不出人意料的事。1922年，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已詳細的鋪陳，為什麼「新聞絕對不是社會現況的鏡子，雖然只是一隅之見，但卻毛遂邀功，以反映現實自居」。然而，晚近的研究所要主張的是，如此的一隅之見是意識形態，因為它所創造的是井然有序而前後一致的世界觀；並且，這樣的世界觀乃是脫胎於當前的權力結構，從而對其有維續的功能。

基於這個觀點而將新聞、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等量齊觀，頗有疑問。我們將略指一二，然後簡短的提出另一個研究三者關係的途徑。這類型的研究，有不少是以BBC作為對象。他們想要解釋BBC的時事新聞與國家（state）的關係；既然這些研究者關心的是關係國家的理論，他們取BBC這個公營電台來做研究，是很可以理解的事。不過，就大多數新聞媒介是私營的事實來看，只分析BBC就顯然會有取樣與推論上的謬誤。

近來關於新聞的分析，一再重複的主題是找出新聞所從由建構的各種架構。怎麼找？方法是在了解日常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細節與態度之後，解析新聞的文意或語意。這類型的研究雖然頗有建樹，不乏洞見，但卻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建構新聞的架構是在何等社會背景下得來的？是那類人以這些架構建構新聞？它們又怎麼成為新聞遣詞用字的一部份？它避開了這些問題，而只是反復的說，新聞媒介是社會體系中「結構性支配」（structured in dominance）的一環。

在文意分析（textual inspection）下，常見的對象是勞資關係的新聞。分析之後，他們發現這些新聞在結構上的特徵是，拘泥於平衡正反雙方的意見，但卻強調罷工對於公眾生活造成的不方便，並避開引述基層員工的談話。然而，這些特徵，總的來說具有特殊性，並非如它們所說的是一般新聞中也常見的型態。由於我們能夠清楚地在勞資關係的新聞中，看出報導的偏頗，從而輕易地理解新聞來源的結構並不健全，〔譯按〕〔我們就容易流於刻板的印象，以為新聞編採過程受到的正只是這樣的壓力，忽視了隱而不顯的經濟力量〕。近年來關於勞資新聞的最重要的分析之作「壞消息」（Bad News）迫不急待的要超出經濟因素來解釋媒介行為：

「經由我們的分析，可見單純強調商業勢力不足以解釋媒介的運轉……在文化上媒介的一項功能是使得社會現狀維續不變，得有合法的地位。電視扮演的這個角色，無分公營或商營，都是一樣。」

如此的觀點，首先是對經濟的範圍抱持了太偏狹的觀點，需知，所謂商業力量的壓力並不只是公私營的問題。再者，這是很怪異的存在主義者的論調，它將電視文化的意識形態作用，當成是內在於電視的一種本質。第三，這等於說我們無需討論生產過程的控制與行爲，媒介從業人員在工作時所能發揮的自主性顯然給排除了。

最重要的是，電視這樣的角色、這樣的功能從何而來？對這個問題，霍爾給予的答案是「發言人」的權力——這些社會精英份子，以符合社會優勢觀點的方式，提供新聞。他說：「簡言之，媒介是在既定秩序中生產新聞的。因為他們必須遵守廣播規章，根據（各級政府與工商）決策人員的言行，從事『公正無私』的報導；因為新聞價值的結構將他們導入某種可以預期與演練的方向，讓優勢團體的行事與動靜廣爲引述。」而這正是文化權力的行使，包含了：「(a)界定那些問題可以進入公共論壇的權力；(b)界定討論這些問題時，使用那些術語的權力；(c)界定誰可以就此發表談話的權力；(d)掌握權力以操縱這些問題在媒介上辯論的過程。」在此看法之下，新聞與統治階層之意識形態透過二個途徑而產生連結：記者與消息來源的觀點合而爲一，以及在制度上二者所屬的組織有所聯繫（其中以廣播機構與國家的關係最爲顯要）。這個看法，規避了一些問題。同樣以BBC新聞作爲對象的一個重要研究指出，「電視新聞所由製作的社會環境至爲重要，儘管BBC認真的要以公共服務爲其特色，但它很明顯的蒙上了商業色彩……新聞與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背景與國家特質，不可以分開來看。」（Schlesinger, 1978:245）。另外一個研究，關心BBC在政治上與國家互動的關係，更勝於前者，在深入分析之後，仍然必須在結論中說明，商業力量透過了什麼樣的方式，提供了什麼架構，「先行底定了節目的製作過程與前提，循此而有關政治的電視節目才得以製作」（Tracey, 1977:245）。

如果只是在政治領域上做功夫，不免流於將追求文化民主的希望，全盤寄託在以國家作爲主要的抗爭領域；而控制文化生產之工具與據此而出現的實際作爲（practice），反倒不是重要的衝突所在。如此一來，大眾媒介只能是被動而無本身意志的輸送帶，綿綿地承載了意識形態，這跟原來他們強調的相對自主性，顯得是多麼突兀。情況既然如此，所有權的結構／生產／控制，甚至媒介與社會中其他權力集團的複雜關係，被排除在分析之外，也就不足爲奇了。霍爾說：「在政治與國家的領域裡，而不是在媒介中，權力產生扭曲」，然則扭曲是如何出現的？霍爾並沒有在歷史與經濟原因中找答案，而是重複的說媒介「自行變成」生產與傳輸文化的重要工具。他說：

（媒介報導新聞，討論問題時）所選用的符碼……在沒有異議之下，落入

了優勢意識形態所使用之詞彙的範疇……因此，儘管事件並沒有以單一的方式被製作成符碼，但新聞人員在遣詞用字時，很容易地會流於窠臼，在非常有限的意識形態詞庫中，援引詞句……如此一來，整個事件顯示出來的「意義」，就掉入了優勢意識形態的漩渦。

探討統治階層之意識與新聞的關係，首先要理解新聞的實際編採等生產過程，以及在最後關卡上控制這些過程的來源。這必須從歷史與政治經濟的角度，從報紙的發展看起。畢竟，廣播新聞有許多先入為主的觀念與實際作業都源於報業。

早期的報業，在出版商與印刷商擺脫特許制度與其它形式的政府控制，取得出版自由之後不久，隨著商業的發達也獲得了獨立的地位，最終則以立法保障了報紙若干程度的自主。從政論（尤其是政黨）報業型態轉向大眾報業的過程，〔以英國為例〕主要的變化發生在報紙經濟基礎的不同。「零售革命」造成了商品需要以不同的廠牌在市場上競爭，進而需要廣告來打開知名度。當時，報紙無疑是刊登廣告的最佳媒介，兩相需要之下，廣告收入逐漸就取代了報份本身的銷售，成為報紙最重要的經濟來源。結果，大幅降低報紙的價格以促成大眾報業的興起，就在此時撒下了種子。以政論為主的報紙，通常還是可以在這樣的局面下繼續存在，代價則是被迫遵循市場經濟的邏輯；而在廣告不足的時候，政黨很可能成為唯一的資金來源，如此就維繫了政黨報紙的存在。

新聞行業的工作型態，在報紙經濟基礎的轉變過程裡，也起了重要的變化。黨同伐異的時代逐漸遠颺，代之而起的是中立的原則，相對地不去冒犯各方立場。事實與意見就這樣被強行的分開。特設的意見評論欄開始出現，「事實」則必須在新聞版面中去找。這樣的區隔，在制度化之後，就有了記者與評論員的不同。

廣播在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的時候，是由收音機與電信工業商賈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以商業營運的方式推動的。現在，廣播已經是重要的娛樂形式，並且也成為新聞媒介。新聞廣播在發展成為獨特的節目形態的過程裡，面臨了三個問題。

第一，廣播組織通常在法律特設下成立，它們的運轉與結構有賴於法令的界定。這些法令的要求，層層往下網羅，變成了廣播的常規（routine practice）。就在廣播組織內化這些法令規章，將它們轉化為節目製作與新聞編採的常規裡，廣播新聞退回了往日報業的軌跡。第二，廣播必須與報業保持一定的距離與自主。起初，尤其是對於晚報來說，廣播被視為具有競爭力的威脅者，報業要求限制廣播的新聞時段與時數是件常事。那時候，電台記者經常依賴報紙做為新聞來源。廣播新聞大有發展的餘地，開創自己的天地，只是日後漸被體認的事實。第三，廣播新聞必須在高度規章化的環境下，遵守它

與政府以及制度上的密切要求，在事實與評論之間，緊緊掌握住分寸。報業新聞產生了客觀的信條，廣播新聞則逐漸加上了無私與平衡的信條。在立法與行政的百般包圍之下，新聞的編採過程與表現形式都有結構上的限制，廣播記者的因應之道就是在這些束縛中，自行界定什麼才是正確的專業標準與工作型態。

從這個背景出發，創造出了所謂的新聞價值。關於新聞價值的討論，往往是說它是在一種神秘而不可穿透的氣氛醞釀出來的。很多學術研究也從此一觀點立論，從而更賦予新聞價值超其所應有的重要性。實際上新聞的編採等生產過程，鮮少是以主動的態度，在高度歧異與豐富的材料中，進行篩選與加工。相反地，在新聞編採的大多數階段，它都只是從原已相當有限的訊息供應來源，在高度規範與常規的制約裡，進行被動的採擷。新聞價值當然是存在而且重要，但它同樣是用來合理化原本就相當受到限制的新聞編採程度。

套用新聞價值的情況有兩種。它們是挑選的標準，在紛亂雜陳的各種事件中，決定那些素材可以成爲新聞。其次，它們是準繩，判定在呈現新聞給閱聽人之時，應該強調或刪節那些部份。是以，新聞價值是成套的工作規則，包涵了職業須知，直接或間接透露了新聞工作室的作業過程。新聞價值並不真的是連從業人員都不甚了然的東西，並不是他們所不能或不願意說明的東西。事實上，它們促進了記者日常工作中，與同儕合作編採新聞的速度。尤有進者，它們提供了簡潔的架構，讓記者產生共識，詮釋新聞的本質與用途，簡化了日益倉促而困難的新聞編採與節目製作程序。新聞一經如此產生，就註定無法交待新聞事件中的權力關係，以及其間人物的社會背景；因此，新聞事件之總合，在結構上就只能呈現出和諧的世界觀，而欠缺批判的聲浪。一國之內的階級與國際權力關係在新聞中消失有許多原因，比如：在地理分工上佈線的限制；明星級人物的強調與進行調查能力的欠缺，造成只能關照各種已經形式化的政治事件。同樣的，社會背景因素的消失，一項重要原因是，在時宜性的要求下，新聞只能呈現局部而無歷史過程的「事實」。

然而，這並不是說，新聞必定是社會強權團體根據本身長久利益的打算所設計的世界觀，這未免簡化了新聞所由產生的情境。職業所設定的常規與記者的信條，不容許強勢團體的流行意念，以簡單而對應的方式，經由印刷或電子媒介而輸送。但同等明顯的事實是，由於不能交待社會權力關係與事件的歷史沿革，媒介中的新聞，必然是排除了可能質疑當前權力分配關係的視野，對於引發當前不平等經濟資源分配與控制的歷史根源，也絕無可能加以探討。因此，我們可以說廣播新聞以不同方式造成意識形態的效果。第一，我們的注意力在它的誘導下，集中在可以化解的衝突事件與機關團體——而

正是在這些地方所提供的新聞素材裡，達成了所謂的社會共識。其次，由於廣播新聞矯飾的要避免讓人從其報導中，留下它有所徇私的印象；加上從業人員對於所謂客觀與中立的執著，它就只能立基於社會中最為普遍的一些價值與信仰上，從事報導。第三，廣播新聞由於歷史與組織上的限制，本質上就不能描繪社會變遷的圖像，也不能展現一國之內或國際之間的權力運作狀況。如此一來，世界成為沒有變遷也無需變遷的靜態圖像，或是在強人英雄及個別人物的聰明才智的貢獻下往前推進，而不是衝突四伏，必須改變的動態過程。

說明新聞媒介的歷史沿革及其基本的經濟結構，並不同於解釋了它們所生產之意識形態的功能與形式。比如說，假使英國的電視新聞是意識形態的呈現，那麼，商營與公營的電台都以相似的途徑，展現了同等的效果。最緊要的是，理解今天新聞形式的根源，還得回溯它在歷史演變中以及在編採生產的過程裡，如何成為一種商品。這是以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大眾傳播的重要任務之一。如果片面而簡化地以為新聞與生俱來就包涵了成套的意識形態形式，則不啻是政治上的失敗者，方法論上的存在主義者。為什麼某些特定的人在媒介新聞裡被「賦予」較高的地位而其他的人則比較少？如果我們希望找出源由，解析激進或政治異端的意見為什麼無法擁有本身的傳播媒介，那麼我們必須從二個方向著手：市場經濟的運作，以及生產過程中，組織與控制的力量發生變化以後，市場機能的回應方式。

晚近，媒介公司與其產品跨國營運的現象是大眾傳播的一項主要特徵，其中又以出版業（雖然其跨國經營由來已久）最為明顯。對於媒介社會學來說，這樣的國際成長，有雙層重要意義。第一，當前資本主義的特徵正是跨國公司的飛躍進展，如果我們想要研究媒介與權力支配結構的關係，就必須依此認識，檢視跨國媒介的運轉。其次，假使我們認為有必要從整組文化生產的結構中，將大眾媒介加以定位，那麼，我們應該將媒介的跨國現象與語言及教育的問題，結合起來一起觀察。這樣的結合，在具有殖民關係的國度，以及當前這些國家對前此關係的因襲，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化依附（cultural dependency）是研究媒介、語言、文化與支配結構之關係的重要領域。雖然本文前面提到的學者都很關心語言的問題，但因為他們只集中分析符號與文意（texts）中的意識形態作用，是以對於產生這些符號與文意的社會過程，茫然無所分析。探討文化依附，必須借重歷史與經濟的途徑，分析依附國家之精英階層的角色，其教育事業以及新聞與文化成為外銷商品的過程。

相同道理，將關照層面侷限在文化與國家的關係，也無法掌握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國際經濟的關連。最近的文化社會學頗有復甦氣象，但至今所見的研究，顯

出它們探討媒介的著力點有所誤置，因為它們完完全全忽略了國際面向。我們以為，這已經不只是研究旨趣或分析之優先性的問題，而是由於將文化社會學抽離其政治經濟環境的情況下，很自然形成的分析盲點〔註5〕。

為數眾多的文化生產單位，與跨國公司有所關聯。很多研究人員都已致力於這方面的發展，最有成績的作品包括了許樂（Schiller, H.）、馬特拉（Mattelart, A.）、黑默林（Hamelink, C.）與佛瑞（Varis, T.）。很可惜的是他們的著作大部份都被前面舉稱的，注重分析國家與媒介的學者所忽視。這並不是說對於國家的分析無關宏旨，但即使是以國家做為分析起點的人，也經不起不去探討國家與國際經濟的複雜關係。比如，研究美國媒介與美國國家的錯綜關係，而沒有討論本世紀美國的擴張過程中，電子與電信工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能的。沒有理解英國資本在後殖民時代的轉變，而想要解釋英國媒介與階級意識形態的關聯，是不切實際的。國家權力的起起落落，要在國際經濟關係中去找尋根源，尤其是跨國公司旗下資本的移動；事實上，這也正是英國資本主義過去三十年來所面臨的所謂危機。左派的一些作家在以國家作為優先分析的對象時，倒重複了自由派的一個過時的觀點，直視全球的網絡，是在各個民族-國家的恆久政治平衡中支撐起來的，真是諷刺。木瑞（Murray, R.）說得好：

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經濟的論述……很讓人詫異的一點是，大多只是強調國家在資本主義之下的鎮壓角色，……鮮少有人注意到國家在資本主義內扮演的經濟角色……

即使我們要全心將意識形態的研究放在政治、而不是經濟脈絡中理解，我們也必然會注意到文化帝國主義的相關問題。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看來，重建一個「新資訊秩序」不再只是重建新經濟秩序的附庸，而是爭取這種新經濟權力所必不可少的一環。從1968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場討論會引發的小風波，迄今脫離文化殖民狀態的呼聲，已經變成了「北-南」對話的重要主題。1973年不結盟國家在阿爾及利亞，1974年與1978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在利馬，在突尼斯，在最富爭端的奈及利亞與印度的會議上，要求「一個新國際資訊秩序」已然是抗爭的核心。

第三世界國家所反對的是文化財貨（cultural goods）（如新聞與電視節目）在市場運作下流通，反對將西方的新聞編採常規與傳播制度原盤不動的引進。這樣子的流通，無異於是充當了優勢國家之經濟支配的「屠城木馬」，或者，它們本身即已對於這些國家的文化自主或文化正統構成威脅。這方面的論爭絲毫沒有出現在近年來關於媒介與政治關係的論述，即使那些顯然想要將國家樹立為研究焦點的人，也未有注意於此。於

此，最值得探討的主題之一是，對於依附國家中「新資產階級」取得權力的過程，文化扮演了什麼角色？此一階層與其所屬國家依附於其它國家的結構狀態，與文化財貨流通的國際結構，大有關聯。他們是文化捐客，是國際精英的一員，在不同國度間來去穿梭，是文化財貨與價值四處流散的潤滑劑，承當了文化工業產品在國際間擴散的關鍵性功能。教育事業與出版行業，是這方面關係很好的說明。

雖然出版在傳統上是小規模的行業，但近世以來已經尾隨其它媒介的後塵，成為跨國跨行的事業，最大的幾家教育書籍與資料的出版商，包括了全錄（Xerox），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國際電話與電訊公司（ITT），西屋（Westing House）等企業集團。出版是國際化的行業。1977年英國出版商的出口書籍佔其總銷售量的36%〔註6〕，愈來愈多的利潤是從各公司在第三世界的子公司而來。大多數銷售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書籍，是用作教科書；而教育與出版的關聯也就這樣搭建了起來，基磐穩固，二者則同樣是文化依附所賴以建立的礎石。想要解釋非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關係，前面論及的聯結，必須是探究的重要環節。唯必須注意的是，文化依附又是國際經濟支配體系這個更為根本之現象的一環，所謂文化依附也只能在這樣的脈絡裡才能理解。

因此，從政治經濟論來解釋文化依附的現象，最佳的理論架構是依附或帝國主義理論。拉丁美洲的理論工作者在這方面已有頗深的建樹。他們的關懷重點是資本主義之歷史發展過程，從殖民時代、帝國主義到新帝國主義時代；及其相應的重商主義，工業上的放任自由，與資本獨佔對於拉丁美洲國家的意義是什麼。由於集中的分析拉丁美洲被征服與殖民的過程，他們遂能排斥主流派的發展觀。他們否認發展的歷程一成不變，舉世皆然；相反地，他們的分析焦點是外人投資與金融控制，如何創造一種環球結構，其間，發展與矮化發展（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只是一體之兩面，二者同步並行。雖然以大眾媒介做為他們的專職研究領域，這些理論工作者，在審視產生經濟依附過程時所衍生的文化依附，總是不會忘記對於整個經濟脈絡保持密切的觀照。法龍（Faraone, R.）指出：

……在拉丁美洲，報界與其他媒介支持當地社會的層級權力結構，以及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大眾媒介之所以扮演這樣的角色，是資本主義階級社會與國際帝國主義運轉之下的產物。

柯拉地（Corradi, I.）也論說道：

當前的工作是，拉丁美洲社會結構及其演變過程，在外環大的國際階級體系的運轉中，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分析的課題。是以，一國的社會結構

與意識的結構，可以作為國際體系之次級結構而加以研究。換句話說，經此途徑而發展出來的就是依附資本主義的理論。

不同的學者所從事的個案研究，分別不約而同的強調了經濟的依附，在不同環節裡起了作用，使研究文化依附必須回歸衡量經濟的因素（Dagino, E.; Duner, B.）。

雖然研究文化帝國主義的結論仍然前後不一，理論也未臻健全；但從這些成果，我們已經可以說，即使一個人所關心的是國家或語言的問題，國際文化工業仍然是一個主要的探討領域。忽略此點，則不僅只是強調的重點有所失誤或研究興趣不同而已。在物質控制結構之外找尋到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百般聯結關係，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是以，發掘這樣的結構，必然是當前以嚴謹態度從事文化社會學研究的人，所應該優先探討的課題。

### 〔結論〕

大眾媒介對於一國之內與國際之間的不平等，大起作用，使其產生貌似合理的狀態。就因為這個理由，我們主張，傳統社會學對於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的研究，應以探討大眾媒介在其間所起的作用作為中心課題之一。我們已經指出，歷來對於此一問題的研究，存在著兩項缺失。缺失之一在對媒介與國家的關係，過度重視；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傳播工具的控制，在歷史上與政治上都有重大意義，只談國家對媒介的影響，就忽略了這方面的大量史實。缺失之二的根源在內容分析的結論難以類推，雖然這個問題由來已久，近年來的馬克思文化社會學之研究的發展卻使它更形惡化，它們一向賦予符號與文意分析所得之「證據」太高的權威。

重新在社會學領域內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研究，是很可喜的現象。然而，在這篇論文中，我們的論點是，善加運用這股研究旨趣之道，還在發展出關於文化生產工業的政治經濟學。唯其如此，建構媒介與意識形態之關係的理論鷹架，才得以植根在穩定而堅固的基石上。

### 〔譯者附記〕

這篇論文原在1978年英國社會學年會（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中發表，後收編於該會議的論文集的198頁至224頁（Barret et al., 1979）。翻譯大體上依原文

順序進行，只在少數地方有所刪節，前前後後，總共約略去三頁有餘的原文未譯。其次，原文引用的著作（者），譯文只存錄譯者認為比較重要而直接相關的部份。這麼做的理由，一為這不是文學作品，容許若干程度的編譯以方便身處不同環境的人閱讀；二則因標明出處，原意是方便有心進一步探究與比對的人得其門徑，並表示作者負責。但譯文與原文面對不同讀者羣，主要目的只是在透過負責的翻譯，使無法接觸本文及其引著的人，得到適當的管道吸收或批評原文的意理。因此，為了襄助中文讀者理解這篇文章，某種程度的刪節，可以算是去除雜枝，浮現主幹的手段。同理，為了這個目的，譯文也在適當的地方加註，並寫就此一短文，以交待該篇文章在英國大眾傳播研究領域的位置。

大體說來，英國媒介研究的主流可以分為二支，一是強調政治經濟層面的分析，比如，媒介所有權的集中，廣告作為媒介財源，造成了什麼後果？一是著重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的解剖，比如，媒介的訊息體系，有沒有與社會中特定階層（如勞工或優勢團體）的文化相連屬，其過程是如何運作的？是不是特別的有利於某些羣體？這二支主流的共同點則是，他們對於英國社會現狀的判斷與保守或自由派的人有別。在他們眼中，英國仍然是不折不扣的階級社會，言論的自由，並保證不了弱勢階層的人得以有效的將其意見傳達而出。簡單的說，他們都是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與政治判斷下，各持己說，從不同角度闡釋英國的大眾傳播現象。目前為止，兩派中又以後者位居要津，發揮較大影響。如果將個中原因侷限在晚近二十年的英國環境裡考察，則無疑地伯明翰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扮演了要角，尤其在現為空中大學（Open University）社會學系教授霍爾（Stuart Hall）出掌主任（1969-1980）的期間更是如此。假使放大來看，文化研究所以成為一時顯學，又必須從西方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來理解。要言之，使得西方的左派人士，從分析高度資本主義化之社會的經濟結構，轉向研究其文化與意識的領域，約有三個主要因素。第一是對於蘇聯官方欽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反抗。目前存在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基於政治上的需求，恣意曲解馬克思的學說，以一種庸俗的經濟決定論詮釋社會現象，將文化與政治等層面化約成為經濟的附庸，否認它們擁有一個別的運作規律。其次則是馬克思本人的早期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在1932年出版。隨著史達林猙獰的俄共主義漸次顯露，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在這些馬克思的讀書札記與批評，找到跳出官方意識形態以詮釋馬克思主義的依據。第三個原因在於，與馬克思本人的預言相左，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畢竟沒有一個因為經濟危機而崩潰。反而在歷經危機之際，資本主義體系呈現不退而擴張的現象（比如，

1929年的危機因為凱因思的理論而化解；當今1980年代的危機則仍在演進）。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在經濟以外的層面出了問題（如，是不是統治階層以文化霸權維繫了體系的存在）？循此追問，西方左派也就開闢了蹊徑，延續了馬克思學說做為非政治意識形態的活力〔註7〕。

本文的兩位作者在1974年率先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指陳英國媒介所有權的演變史，並分析其病症，算是打出馬克思原始旗號的第一聲。四年後，他們在這篇論文中更直接面對同在一個陣營，但著力點有別的文化論者，展開伐異的理論工作。英國的大眾傳播研究，自此樹立一股清晰的政治經濟派別。一九七九年創辦，至今已為該國此一研究領域最為主要刊物的「媒介-文化-社會」（Media, Culture & Society），從一開頭就標示著這個立場（Garnham, 1983:2）。

台灣社會處於轉型階段由來已有時日，大眾傳播事業所受衝擊也大。或許可以說，儘管現時而言，政治力量也許（但也許不是）大於商業力量，是主宰大眾媒介動向的關鍵；但如果没有防患未然的政策，經濟力量似乎注定要反撲回來，易客為主，成為控制媒體的最重要勢力。英國學者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應該值得我們借鏡。

## 〔註釋〕

1. BBC是不是日愈商業化，可以從二個層面來看。第一，它的收入來源。第二，它的節目內容。除了海外廣播部門（External Services）是由英國財政部支付之外，BBC的收入主要由執照費與該機構的商業營運所得（BBC Enterprises Ltd. 1960年成立，1986年合併BBC publications）組成，二者的比率，可以參見下表，商業所得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從1975年的3.30%到1986年的9.72%。另外，BBC並計畫在一九九三年以前，倍增商業所得至二億一千五百萬英鎊（GLARDIAN, January 2 1989:19），可見，商業所得的比例，將只會高於或維持在目前的10%上下的水平，不會降低。

其次，相對於前一個指標，BBC的節目內容是不是與商營的獨立電視台（ITV）逐漸比同，比較不能明顯的察覺。不過，1954年成立ITV以後，BBC為了保有50%以上的觀眾以求在政治上得有正當理由徵收執照費，因此相應的「還俗」，使自身的節目與ITV少有差異，也是不爭的事實。正因為二者只能迎合觀眾的部分需求，所以才有1964年的成立BBC第二廣播網，1982年的第二商業網（Channel 4）以照顧這些觀眾的另一部份品味。1988年冬季，英國報端不時披露，BBC考慮多播放關於「性」的節目，做為招徠觀眾的手段，也算是該機構面臨商業壓力的一種表現。最後

表一：BBC之執照費與商業營運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年度	總收入（百萬英鎊）	執照費*（%）	商業所得*（%）
1975	151.4	96.70	3.30
1980	478.3	89.46	10.54
1986	1084.1	90.28	9.72

資料來源：BBC Annual Report 1976: 90, 95; 1982: 97; 1987: 129, 133.

\*執照費指未扣除徵收過程時耗用的行政費；商業所得指營業總額（turnover），而非利潤。

，新視聽媒體漸次普及以來（尤其是有線與衛星電視），伴隨1980年代風行各國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s）等「自由化」的呼聲，使得西歐傳統深厚的公共廣播系統險象叢生，面臨解體的威脅，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實。關於這個問題，無法在這個小小的註解中交代。

2. 二氏的中文介紹，可以分別參見謝國雄的「文化研究巨擘——雷蒙·威廉斯」，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張錦華的「批判理論——賀爾文化研究簡介」，新聞學研究1987, 5.20, v.39。威廉斯於1988年初辭世，當代月刊1988年四月號譯有他的一篇文章（第24期）「文化與無政府百年誌——悼念英國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士（胡玉／譯）」。聯經出版公司出版的「思想」季刊創刊號（1988）另譯英國士人悼念威氏的一篇文章。此前，民社黨的刊物「宇宙」（1987或1988年初）也譯了威氏的短論。
3. 關於湯普生的著作與事蹟，中文的介紹可見「文星」103期（1987.1月）；「英國的良心——湯普森」。
4. 比如，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1986年的30萬銷數（每週），只有8萬份在本土出售，但最好的例子莫如以Rupert Murdoch做為代表。梅鐸一人的媒介集團，1985年的部分資料如下：

	美國	英國	澳洲
總營業額（百萬英鎊）	909	551	396
報紙	4	4	17
雜誌	19	5	2
電視／收音機站	7	--	2
影片公司	1	-	--
出版公司	--	5	2
其它	1	4	4

資料來源：Social Study, 1988, Sep.

國際化的文化事業會有什麼結果？在關於媒介與文化帝國主義的正反討論中，對此已有很多的文獻可供參考，此處不能引述。但就在英國有一個鮮活的例子，主角仍然是梅鐸，他爲了要强佔、鞏固、擴充他在美國的霸業，必須拿其它事業的盈餘作爲挹注，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86年初在英國爆發了一場革命，資方挾帶科技之賜大舉得勝，改變了英國性報業（National Newspapers）的傳統作業方式（People and the Press, 1987）。

早在1978年，梅鐸集團就已蓄勢待發，先行在倫敦買下13畝的河床地。二年後並開工建新廠，推行電腦化作業，準備換下大批人工，以抽取因此而省下的資本，到美國購買二十世紀福司（FOX）影業公司。消息傳出以後，工會自然採取對抗措施，從此雙方經歷了多次的談判，但一直無法達成協議。1985年初，梅鐸手下來自澳、英、美的經理人員，齊聚紐約，共商大計，決定避開傳統的組版方式，訓練記者直接輸入，節省大批工人。該年內，相關的工會陸續接獲消息，知道資方將採取的手段，但大多不相信梅鐸會或者有能耐採取如此絕然的殺手鐮。加上不同的工會有相左的利益，他們也就沒有採取一致的步驟以資對抗。1985年底，梅鐸的律師（Geoffrey Richard）再次建議，爲求節省大筆的差遣費，不妨引誘工會在不合法的情況下罷工。果然，次年的元月十三日梅鐸成功的達成目的，傳統印刷工人五千餘名一夕之間失去工作。

5. 對於本文作者的批評，〔文化研究忘卻了分析的優先次序（priority），以及沒有堅持經濟因素在最後關卡的決定性作用〕，霍爾在其他地方有間接的答覆（Hall, 1986; 1988: 63, 72-3）。霍爾說，由於知識上的分工使然，沒有人能夠照顧到各個重要的環節；他很清楚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但只能就他比較專長的項目提供解析之所得。其次，他反過來說，單單堅持經濟要素在最後關卡的作用，未免流於慵懶，好像沒有人為的努力就自動會使資本主體系崩潰，他寧願說，正因為經濟力量在很多社會現象中，都率先（in the first instance）產生影響作用，人為的抗爭才更顯得必要。馬克思不是萬能藥，不能保證任何善果的發生（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
6. 英國出版的書籍，外銷例一向很高。比如1940年是35%，1950年是31%；1960年是39%，1970年是44%，1980年是30%（資料來源，Peter Golding 課堂講義）。
7. 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要與發展，英文可以參見J. G. Merquior的“Western Marxism”，1986, London: Paladin Books（台北有唐山書局翻印本）。中文則許津橋著有長文，是介紹中自有批評的佳作，相當值得引讀，見其書「社會理論與政治實踐」（台北圓神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的頁1-28，“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浪漫旅程”。

## 參考資料

- Barrett, M., P. Corrigan, A. Kuhn & J. Wolff (1979)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 Connell, I. (1978)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the Media”, in S. Hibbin, ed.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Garnham, N. (1983) Editorial, Media Culture & Society, 5(1).
- Hall, S. (1973); Encoding &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CCCS Birmingham, mimeo.
- (1975). “Th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 Events”, in Getting the Message Across, Paris: Unesco Press.
- (1976). “Broadcasting, Politics and the State: the Independent Impartiality Coupl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1978). Reformism and the Legislation of Consent, CCCS, Birmingham, mimeo.

- (1986). "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28-44).
- (1988).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35-74, London:Macmillan.
- Hall, S., I. Connell, & L. Curti (1976). "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 WPCS, no.9.
- Murdock, G. & P. Golding (1974).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Socialist Register 1973.
- (1977a).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urran et al(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Edward Arnold.
- (1977b). "Beyond Monopoly: Mass Communications in an Age of Conglomerates", in Beharrell et al. (eds), Trade Union and the Media, London:Macmillan.
- (1986): "Unequal Information: Access and Exclusion in the New Communications Market Place", in Ferguson, M.(e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Sage.
- Press Council (1987).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London: Press Council.
- Schlesinger, P.(1978). Putting the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 London:Constable.
- Tracey, M. (1977). 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al Television, London:RKP.
- Williams, R. (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Penguin Books.
- (1968), Communications, (2nd ed.) Penguin Books.
-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Fontana Books. ■